

《新中国工业经济史（第三版）》评介

武力

中国现代工业的萌发如果从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算起，至今已有150多年的历史。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80多年里，中国的工业化屡屡受挫，于艰难蹒跚中曲折前行，其情形和缘由国内外学者已备述。尽管对于今天的改革和发展，新中国建立以来60多年的工业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历史更具“借鉴”作用，但是其研究队伍和研究的深度、广度远远不能满足现实“经世致用”的需要，因此，作为研究新中国经济史的学者，常有焦虑之感。近日捧读汪海波先生的新作《新中国工业经济史（第三版）》（经济管理出版社，2017年3月），既喜且愧，喜的是86岁高龄的汪先生老当益壮，宝刀未老，与时俱进，将他对中国工业经济史的下限从2000年推进到2015年，愧的是我们这些后学未能跟上汪先生的步伐。通读《新中国工业经济史（第三版）》，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本书作为汪先生耄耋之年的著作，凝聚他50多年来从事研究的经验，更加强调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分析问题。汪先生在该书的“序”中即开宗明义，强调本书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指导研究和撰写新中国工业经济史。汪先生特别指出：“抛开西方经济学的少数流派不说，总体看，条目总是舍弃生产关系孤立地研究生产发展，这是他们的痼疾。而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则认为，必须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相互作用视角来研究生产发展”。该书的研究和写作正是贯彻了这个思想。

第二，对2001年之前50多年的工业经济史论述文字更简练、思考更深刻。学术研究和论著的写作规律是，往往要经历一个由简到繁，再由繁到简的深化和提炼认识的过程。一开始都是想多写，尽可能地给读者提供全面的信息，唯恐有材料遗漏、观点不全面、论述不深刻，但是等到研究进入更高层次后，就能够做到对材料取舍有度，观点精准简练，思想表述微言大义了，因此，论著的字数就得到较大的压缩。汪先生的这本书体现了这个特点，1986年的第一版为42万字，2001年的第二版为176万字，这次出版的第三版为77万字，正好印证了这个规律。

第三，研究对象的时间跨度更长了。历史研究中有“沉淀说”和“跟进说”两种方法。前者主张历史研究的对象要与当今有一定距离，等“历史的尘埃”落定再来研究，这样不仅在客观上可以对历史事件的因果和人物的得失看得更清楚，而且也较少受到研究者本人利害关系和感情的影响；后者则从历史学的“经世致用”和研究者亲身体验的角度，主张历史研究应该“跟随历史”前进，昨天就可以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汪先生作为当代经济史的研究者，采取了当代史大多数学者使用的后一种方法，将研究对象的时间下限不断延伸，始终跟随新中国前进的脚步，不断地回过头来看尚未远去的历史。该书的特点之一就是 will 新中国的工业经济史研究对象延伸到2015年。作为第三版，使用了14章（全书共62章）的篇幅叙述21世纪以来的工业经济发展历史，尤其是对2012年以来工业经济发展的叙述，虽然研究对象只有4年，却用了8章的篇幅，比较系统地梳理了这个阶段中国工业经济发展的脉络。

新中国近70年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从根本上说，是一个人口最多、历史文化最灿烂的大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快速转变的历史。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工业化又是核心，而工业化中最主要的因素则是现代工业的发展，即通过工业的发展来改造传统经济，带动整个产业结构的升级，而这个过程又受到中国人口多、底子薄、发展不平衡以及后发大国等因素的影响，呈现出极为复杂的历史现象和轨迹，不仅实证研究迷雾重重，现有的经济学理论也往往无法解释，需要下大功夫去研究。在这方面，汪先生的这本书提供了一个示范：不断探索、不断跟随历史前进。

（武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